

和李济生先生在绍兴路的日子

岳洪治

“因为一个人而喜欢了一座城。”忘记了在哪里看到的这样一句话，然而，却觉得这话是不错的。对一个地方的喜欢、爱，以至眷恋，虽然可以有各种原因，但是，那最主要的原因，无外乎那里的某种美食、某处美景，或是某个与你关系亲近的人，使你心心念念，难以忘怀。在这几条之中，那最重要的，恐怕还是那里的某个人，常在你心里，让你放不下。

我喜欢上海，总想有机会再回到当年读书的复旦校园走一走，再到熟悉的南京路外滩和绍兴路、打浦桥一带走一走，再到香气满园的桂林公园逛一逛……这些，都和一位我尊敬的长者有关系，——他就是巴金的胞弟，李济生先生。

要说清楚我与李济生先生相识的经过，和一份难得的友情，先得从我的毕业实习开始。

1975年春节过后，就临近了我们1972级同学毕业的日子。过完年假，我和另外几个同学，就按规定，被系里安排到上海文艺出版社，去完成为期半年的实习。我有幸被安排到了名老编辑荟萃的文艺部。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，文艺部的办公室，占了二楼朝南的一个宽敞明亮的大套间。办公室里间，是一个接近正方形的大屋子，那是几位女同志的专属领地。她们各自姓名甚多，现在已经记不清了，唯一记得靠窗坐着的一位，是邹韬奋先生的女公子邹嘉骢老师。外间屋里，两个台球案子大小的长

桌，首尾相连摆在一起，从近门处一直排到南窗下。长桌东侧靠门口一端，坐了一位三十来岁，手脚麻利的年轻女同志。她是编辑室的秘书，负责一些比较繁杂的编务工作。坐在她左边的是钱迅坚老师，一位四十多岁，剪短发，举止干练的女编辑。实习期间，钱老师曾带我一起到上海近郊组稿。我到北京工作后，1976年重返上海出差，回文艺社看望老师们的时候，还是钱老师请我在社里吃的午饭。

我的座位在长桌的西侧，与秘书大姐相对。从我的位子往南数，紧挨着我的是姜金城老师。他是一位诗人，知道我写诗，就热情地签名送了我一本，他新出的诗集《海防线上的歌》。后来，还介绍我认识了在上海歌剧院做编剧的诗人，王宁宇老师。从姜老师再往里的一位，是文艺部负责人江曾培

老师。我离开上海不久，就听说江老师担任了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社长和总编辑。从江曾培老师再往里，靠窗边位置坐着一位，就是编辑部里最年长、资格也最老的李济生先生了。这就是我今天记得的，当时文艺部的全体人员了。

和先生们在一起时间久了，我才慢慢知道，李济生先生是巴金先生的胞弟。他不但是一位老编辑，也是一位作家和翻译家。早在抗日战争时期，他就参加了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工作。在艰苦的战争环境里，他和出版社一起颠沛流离，共克时艰，从广西桂林到贵州独山，而后又到重庆。年轻时，他曾为成都《华西日报》、重庆《商务日报》等报纸副刊撰稿，并从事翻译工作。1949年后，他随同巴金和文化生活出版社一起到了上海。1954年公私合营，文化生活出版社并入上海新文艺出版社，他从此成为该社外

国文学编辑室的一名编辑。195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成立后，他又进入文艺社，还是做编辑。

然而，我和李济生先生真正的接触，却不是上班工作的时候，也不是在办公室里，而是在工余时间，在文艺社门外的绍兴路上。

为了保证实习生能够按时上下班，出版社安排我们住在了打浦桥450号的出版社招待所。每天下班后，我们只需从出版社所在的绍兴路往东走到瑞金路，再向南走一两站路就到了，很是方便。在文艺社实习的半年里，每天中饭后的午休时间，在同一张大办公桌前坐了一上午的先生们，都会一起到街上走一走，闲聊上一阵。这种紧张工作后的放松和难得的聚会，每一次，我都不会错过。总是兴致勃勃地参与其中。走在树影婆娑，幽静而美丽的绍兴路上，我总是一边轻松地跟着前辈们来回踱步，一边满怀兴味地聆听他们海阔天空地闲聊。在几位师长当中，数济老最年长，也数他最为活跃。济老身材高大而略显清瘦，举止从容，目光谦和。大家一起在绍兴路上散步的时候，他总是迈着轻捷的脚步，走在大家中间。他讲话声音洪亮，性格爽快而开朗，是一位很受大家尊敬和欢迎的长者。而今，当年大家一起散步时都聊了些什么，早已经淡忘了，唯有绍兴路上那洒落一地的斑驳树影，街路两旁古老的弄堂与房舍，和济老那潇洒的身影、爽朗的笑声，仍然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。

大学毕业后不久，我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。因为做《新文学史料》杂志的编辑工作，有机会接触到许多文学大家和他们的文稿。读前辈的书信文章的时候，尤其是在第四届文代会上，采访过巴老之后，便自然地又想起了巴金胞弟李济生先生。终于有一天，我忍不住，贸然地给他老人家写了封信。由此，便开启了一段文学前辈与一个懵懂少年长达数十年的书信往来。

济老来信中，现存最早的一封信，是他收到我寄去的《露沙的路》之后，给我的回信：

洪治同志：
想不到你在人文现代文学编辑室，事隔二十年了，你还记得我。老实说我倒真想不起来，年纪大了记性不行了。不过要是见了面，说不定还能认得。你说经常一起午间在外散步，那时“四人帮”还没垮台，“文革”尚未结束，真是一场噩梦啊！
谢谢你的书。先只是在报纸上见到别人的介绍，在一篇短文中提及，后来有一退下来的老记者跟我讲，劝我不妨找来一读，也不告诉书的内容。因之渴思一读。不久前奉化同行的冯英子老人也对我讲，更思一探究竟。
韦君宜同志曾见过两面，还是六十年代初叶。她来上海住出版社，甚当酷

夏，看稿必须挥扇。其艰苦朴素，认真工作的精神，令人心服。也是出版社的领导，一二·九时代的大学生，再历“文革”，思前想后，早有所悟也。作品虽然仅写了延安时期的一段经历，由不待续也，可概其梗矣。
你是在编辑室吧？编有些什么书啊，一定成绩不错吧。勿复，即问
编安

李济生
(1995)十一、廿八

《露沙的路》是我社原总编辑、社长韦君宜，以自身革命经历为素材而创作的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，1994年6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

作者在《后记》中写道：
这本书是早就想写，也早就可以写的。一直拖到病倒之后，才勉强执笔，把这点意思就将就写出来。
写的时候，已经是脑溢血发作过，半身不遂，手脚都不方便了。只有脑子还有一部分管用，心想，人活着，能做多就做多少吧。谁病到这样还写小说呢？但是我得写。一天写一点点，今天记住明天要写的内容，用了过去写两个长篇的劲，写了这十来万字。

意思见于书本身，不再烦絮。反正我写的是我确曾涉足过的生活，我决不愿把虚夸的东西交给读者。

我能坚持写出这本书，应当感谢王笠耘同志的鼓励。他说：“相信你写得。”他还仔细看了稿。还有许显卿同志也看了稿，由此可以看出朋友的鼓励对于一个衰残的人的作用。

韦君宜
1993.7.于北京

原来，《露沙的路》竟是在如此不寻常的状况下写成的，而这部书的作者也是一位不寻常的女性。因而就不难理解，为什么这部小说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，以至在问世二十年后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该书的增订本，同时还有一个《出版说明》：

1994年6月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《露沙的路》。二十年后，我们重作修订，并增加作者1938年日记片段和作者的相关题材小说三篇，使读者了解“露沙”的来路与归处。谨以此增订本纪念《露沙的路》出版二十周年，纪念写作此书及《思痛录》的作者韦君宜先生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2014年6月

韦君宜在该书《后记》中特意感谢的王笠耘、许显卿两位同志，都是人文社当代文学编辑部小说组的老编辑。正如作者所说，他们的鼓励与帮助，对《露沙的路》的写作与出版，起了很大的作用。这是一位女性革命者的自传体长篇小说，这部书的写作与作者不同寻常，所以，远在上海的济老，才会想要读到这部书。另外，正如济老信中所说，当年，韦君宜到上海“住出版社，甚当酷暑，看稿必须挥扇”，“其艰苦朴素，认真工作的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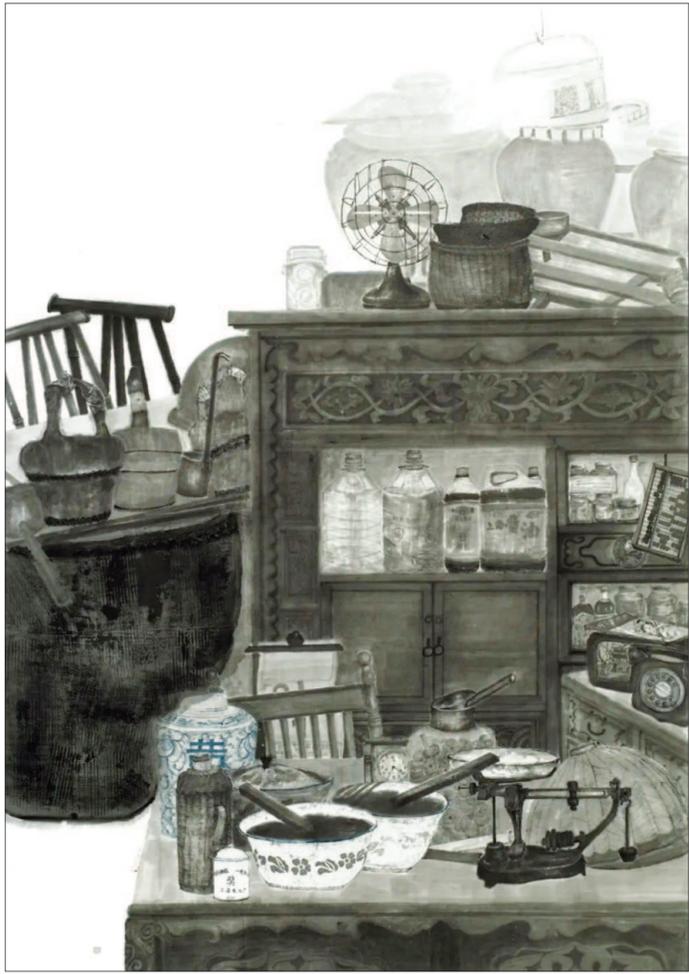
神”令他“心服”。大约这也是他想读《露沙的路》的一个原因吧。

在此后的几年里，我与济老不断有书信往来。有时，是我为编辑《新文学史料》杂志向他约稿；有时，是他托我代购某种热门书；也有时候，是我要给他邮寄某种稀有图书，或是他要给我邮寄一本值得珍藏的好书。譬如，1996年8月23日济老的来信，除了回应我的约稿事外，并随信寄赠我一本他和巴老女儿李小林共同编选的《巴金七十年文选》。信中还说：“随函寄去《七十年文选》一册。巴老养病杭州，无法签名，正好他有图章在手边，为应出版社要求印上若干本作纪念本之用。”又如，在收到我寄回的曹聚仁的回忆录《我与我的世界》之后，济老于1996年9月23日来信询问：“未知《我走过的道路》(茅公的)，老舍的《生活与创作自述》，及《从文自传》三书，都能找到否？共若干款请示知。当汇率代购如何？”1997年5月30日的来信说：“又得麻烦你一件事，三联书店出的一本兰(蓝)英年写的有关苏联的种种文章，书名叫《寻墓者说》。此间尚未见到。劳神请代购二册。多少钱示知，当即邮奉汇还。劳神了。至托。”济老博古通今，眼界宽广，编辑工作之外，又能持创作与翻译两支大笔。旺盛的求知欲和创作欲，促使他好学不倦，让我帮他代购图书，也是来信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每年的“六一”儿童节，是孩子们最盼望和高兴的日子。1998年儿童节这天，收到济老来信，我也像孩子一样高兴了。

来信是托我代购一部《巴金译文全集》：“我又有一事相烦，你看能否在你们出版社代我买一购(部)。如果能够，请告知需款多少。当立即汇去。因急需。巴老自己购的，都已送光。此间书店又从未见到，不知何故。想系印得少，书店到书就少了。上不了书架，或摆出来没两天，就光了。真是买书难啊！”《巴金译文全集》10卷，大32开，精装本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6月出版。由于印数不是很大，而读者的热情却很高，当年在北京要买一套，也颇为不易。济老在上海一时未能买到，也是不足为怪。

济老一生以编辑出版工作为业，同时又是著名作家和翻译家。他和巴金一起工作、生活，接触过许多人，经历了许多事，是《新文学史料》最合适而难得的一位作者。我作为《新文学史料》杂志编辑与济老通信多年，不但工作上得到他的支持，在做入上也获益良多。虽然和济老朝夕相处的日子，只是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实习的半年，但是，我和济老的通信，前后却有数年之久。至今，每当想起济老，眼前就会出现他那和蔼关爱的目光，耳畔仍会响起他那洪亮爽朗的笑声。我想，在过去的许多年里，济老一定会偶尔想起我的吧。如此说来，我和济老在一起的日子，又何止半年。



筆會

精釀

(国画)

张奕文

选自“譬如青春——第十七届上海青年美术大展”

大家都知道，我国古代有四大美女，她们分别是西施、王昭君、貂蝉、杨玉环。相应的，有美女就得有美男。那么，我国古代的美男是谁呢？大家也都知道，是生于魏晋时期的潘安。大概是为了对称，也是为了凑数，据说我国古代的美男也是四位。除了潘安，人们很难说清其他三位姓啥名谁。也就是说，国人公认的美男只有潘安，他是我国从古至今的第一位美男子，也是唯一一位被亿万民众普遍认可的美男子。

公元247年，生于河南中牟县潘安庄的潘安，名岳，字安仁，小字檀奴，也被人爱称为檀郎，潘郎。他到底有多美呢？他美到何等无以复加的程度呢？这是一个悬念，一个美好而巨大的悬念。

好了，到了公元2009年，中牟县拟筹拍一部关于潘安故事的电视剧，要把潘安的美好形象搬上荧屏。我和刘恒，还有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的编剧徐小斌，有幸被邀请为电视剧的顾问，到中牟参与了剧本的策划，座谈。我们一致认为，这是一件大好事。潘安被遗忘和尘封得太久太久，现在终于可以请出来与观众见面。盛世修文，盛世尚美，此时把潘安的形象搬上荧屏，恰逢其时，正好可以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美的向往和期盼。执笔写剧本的，是我的一个煤矿上的朋友，叫翟平。他初步计划写20集，电视剧的名字叫《美丽潘郎》。看了剧本第一稿，我曾有些担心，不知我国当代有哪一个男演员，能担负潘安这样一个名垂千古、名扬天下的美丽角色。真的，我把我所知道的我国比较有名的男演员在脑子里扒拉了一遍，觉得没有一个当代的演员能够胜任。他们通过化妆、美容、造型，或许能模仿一下潘安的外表，可他们怎么接近潘安的内心里世界呢，怎样能表现出潘安那样一种深厚的、独特的古典美的气质呢！我甚至想到，在潘安的形象没搬上荧屏之前，他的形象几乎是抽象的，一万个人可能对他有一万种美好的想象。可一旦搬上荧屏，万千想象集于

一身，他就被具象化了，也被局限住了，反而影响了人们对他的无限想象。这些想法我当时并没有说出来，在积极推动剧本创作成功，希望电视剧能够早日投入拍摄。

关于潘安的历史资料有限，可供挖掘和发挥的资源少而又少，要编一个几十集的电视剧本谈何容易。尽管编者几易其稿，衣带渐宽，付出了极大的辛劳，并不惜在剧本中加入一些官斗和魔幻的情节，剧本离表现潘郎之美的初衷还是越来越远。可能还有其它方面的原因，反正计划中的电视剧最终没能投入拍摄。这件事没做成，我感到遗憾。因为我是电视剧的顾问之一，电视剧的流产，我认为自己担有一份责任。我深感对不起潘郎，连对潘郎掬一把辛酸泪的心都有。

2023年11月初，中牟县第八届“雁鸣金秋”笔会举办之际，我得到邀请，欣然前往。我之所以愿意再去中牟，很大程度上冲着潘安去的。且不说潘安是中牟首屈一指的传统文化代表人物，是中牟的一张闪闪发光的历史文化名片，因内心觉得欠着潘安一笔账，很想对潘安的出生地潘安庄拜谒一番，以表达这对潘安的怀想、谦意和敬意。在中牟几天，所见所闻，让人欢欣鼓舞，不可备述。记得在一个对话会上，我开口就说：中国有中原，中原有中牟，中牟是中中之中。中牟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，堪称中华大地上的一个美丽缩影。笔会散会后，朋友们各奔东西，我一个人留

了下来。由县文联领导亲自驾车，专门送我去了一趟潘安庄。潘安庄后来分成大潘庄和小潘庄，潘安的出生地在大潘庄。1996年，大潘庄人自发捐地筹款，在潘安故里建起了潘安游乐园，并于当年十月向公众开放。2012年，中牟县人民政府将潘安游乐园进一步扩建，改造，建成了占地百亩有余的潘安主题公园。在公园里，我整流连逛了一上午，瞻仰了亭亭玉立的潘安雕像，参观了图文并茂、内容丰富多彩的潘安纪念馆，与潘安文化研究会的专家们进行了交流，并获赠《潘安作品集》《潘安系列传说》等三本著作。这次系统的参观、学习、交流和阅读，使我对潘安之美有了更全面和深入的了解和认识——潘安的美不是表面的，是深层次的；不是单一的，是综合性的；不是短暂的，是持久性的。也就是说，潘安之美，绝不仅仅是貌美。我相信，人世间生得貌美的男人很多很多，但绝不会因长相好看就可以得到世人的青睐，就可以流传千古。除了貌美，还有许许多多其它美的元素融合在一起，才构成了潘安的多元之美、复合之美、立体之美，才形成了无与伦比、神话般的美丽传说。

请允许我从潘安的姿仪之美、才华之美、情感之美、政声之美四个方面，简单想象一下这位中华民族历史上美的巨人：

姿仪之美。对于潘安的美貌，《晋书·潘岳传》和《世说新语·容止》里，都有明确记载和生动描述。前者在传记

河南潘安

刘庆邦

里说：“少时常挟弹出洛阳道，妇人遇之者，皆连手萦绕，投之以果，遂满车而归。”不难想象，当潘安乘车在洛阳道出游时，被一些对潘安心仪已久的妇人们看到了。有人惊喜地发一声喊，她们纷纷拉起手来，拦住了潘安的车。她们围成一个圆圈，环绕着潘安，喊着潘郎，潘郎，又唱又跳，又哭又笑，形成一种类似狂欢的场面。那些妇人争相把提前准备好的鲜花和水果往潘安乘坐的马车里投，以致车厢里堆得满满的，微微含笑的潘安几乎连站立的地方都没有了。例不必多举，仅此一个细节，就让我们知道，当时的人们对潘安是何等的崇拜备至，何等的喜爱连天！当今有一些明星，他们也拥有一些所谓“粉丝”，可有哪一位明星，能像潘安这样受到如此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呢！狂傲洒脱如唐代的大诗人李白者，都禁不住赋诗对潘安赞颂道：“白玉谁家郎，回车渡天津。看花东陌上，惊动洛阳人。”

才华之美。俗话说郎才女貌，比起重视女人的貌，国人好像更重视男人的才。如果男人的才学不高，长得再美也不堪重用。而潘安的美貌和才高相辅相成，是典型的才貌双全。在关于潘安的传记里，一开篇就说：“岳少以才颖见称，乡邑号为奇童。”也是在传记里，称赞潘安的文章“辞藻绝丽”。像“绝丽”这样对文章的评价之词，我以前从未看见过。一个绝字，是说潘安诗赋的辞藻之美是前所未有的，后世也很难出现。如此高的评价也真够绝的，不免让人心生

敬畏。22岁那年，初入仕途的潘安，目睹晋武帝躬耕之事，有感而发，创作了热情洋溢的《籍田赋》。所赋虽不乏歌功颂德，但也表现出潘安鲜明的民生民本思想，颇得当朝赏识，遂成为潘安成名之作。之后，潘安陆续写出了《西征赋》《秋兴赋》《闲居赋》《怀旧赋》《笙赋》等篇章，每一篇都精彩之至，不同凡响。除了写赋，潘安还写了大量的诗和诗。据《隋书·经籍志四》记载：“晋黄门郎《潘岳集》十卷。”潘安是西晋“太康文学”的代表人物。魏晋有包括嵇康、阮籍、刘伶等在内的竹林七贤，恐怕哪一贤都不如潘安所作的作品多。在士大夫阶层所推崇的魏晋风度中，潘安的风度无疑是一道光彩夺目的彩虹。

情感之美。人类是高级情感动物，在所有的审美范畴中，情感之美历来是美的核心。潘安的情感自然、真诚、充沛、温柔，与天情深，与地情深，与人情深，一生留下了许多动人情肠的故事。在我国民间广为流传的《二十四孝》早期版本中，就有潘安“弃官奉亲”的故事，附诗赞曰：“弃官从母孝诚，故里牧羊兼种田。籍以承欢滋养母，复元欢乐事天年。”当时，潘安正任职长安令，母亲跟他一起生活。母亲生病后，产生了强烈的思乡之情。潘安得知母亲的心愿后，毅然辞官，送母亲回乡。回到家乡，为了奉养母亲，他耕田种菜，“以供朝夕之膳”。还养了一群羊，每天挤羊奶给母亲喝。潘安的这些所作所为，在他的《闲居赋》里有详细记述。更感人的故事，是潘安对结发之妻杨容姬的忠贞不渝。像潘安这样的盖世美男，不知有多少多情的女人迷恋他呢，又不知有多少风流的女人甘心情愿向他投怀送抱呢。可潘安高洁自重，只钟情于自己青梅竹马的妻子，一点绯闻都没有。谓予不信，读读潘安为妻子写的《悼亡赋》就知道了，那是何等的情深意重，泣泪泣血，痛断肝肠。在魏晋之前，极少有丈夫悼念妻子的篇章，是潘安开了“悼亡”的先河，后世的哀悼亡妻，均以“悼亡”为题，形成了“悼亡”文学。

政声之美。潘安因“才名冠世，为众所疾”，一直没得到较高的职位。但不管潘安到哪里任职，都注重察民情，启民智，解民忧，为民造福，赢得了老百姓的爱戴。比如，潘安到河阳县任县令时，当地的百姓饥寒交迫，穷得没命。他上任后，一不骑马，二不坐轿，独自一人便衣出行，到民间察访，把河阳县的山山河河、村村寨寨差不多走了个遍。他根据河阳县的地理水土、气候风物等特点，在鼓励百姓种好五谷、养殖六畜的同时，还大力倡导栽种桃李花木，并张榜行令，告示全县。在潘县令的指引下，河阳县在全县的沟坡、沙地、房前屋后，广种花卉，遍栽果树，使河阳县很快百花争艳，桃李遍地，在全国赢得了“河阳满县桃”和“河阳一县花”的美誉。李白在河阳游览后题诗称赞：“河阳花作县，秋浦玉为人。地逐名贤好，风随惠化春。”潘安在怀县任县令时，也取得了世所公认的政绩。五百年之后的杜甫，在诗中把潘安的姓氏冠在县名的前面，尊称潘安为“潘怀县”。有李杜的诗作为证，可见潘安亲民爱民的政声之美影响多么广泛和深远。

至于潘安因陷于党争和内斗，一生以惨绝的悲剧而告终，则可另当别论。

我还是衷心希望，有朝一日能把潘安的形象搬上荧屏，让全国人民一睹潘郎的风采。

2023年12月7日至12日于北京光熙家园

